



# “算账”破难题

李辉

“11月咱队计划掘进201米，实际完成223.1米，超进尺22.1米。工长，那这个月就有增量分红吧？”“必须有！”  
这段对话中的工长名叫张军瑞，是山西长治漳村矿综掘二队（以下简称“综掘二队”）生产一工段工长。去年11月，张军瑞所在班组掘进66排，累计掘进超3.9米。因当月作业期间瓦斯高、煤墙松软、地质构造复杂等不可抗力因素过多，一工段在3个生产班中掘进尺最少，精益

分仅有10250分，分红8727元。不言而喻，超进尺越多的班组，获得的分红奖励就越多。  
增量分红是漳村矿通过“班组合伙人”机制，在队组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，按照“定、控、算、改”开展班组生产任务核算工作，并签订作业承包责任书的一种绩效奖励方式。其中，超出计划产生的效益由煤矿拨出专项资金进行奖励。漳村矿是潞安集团“班组合伙人”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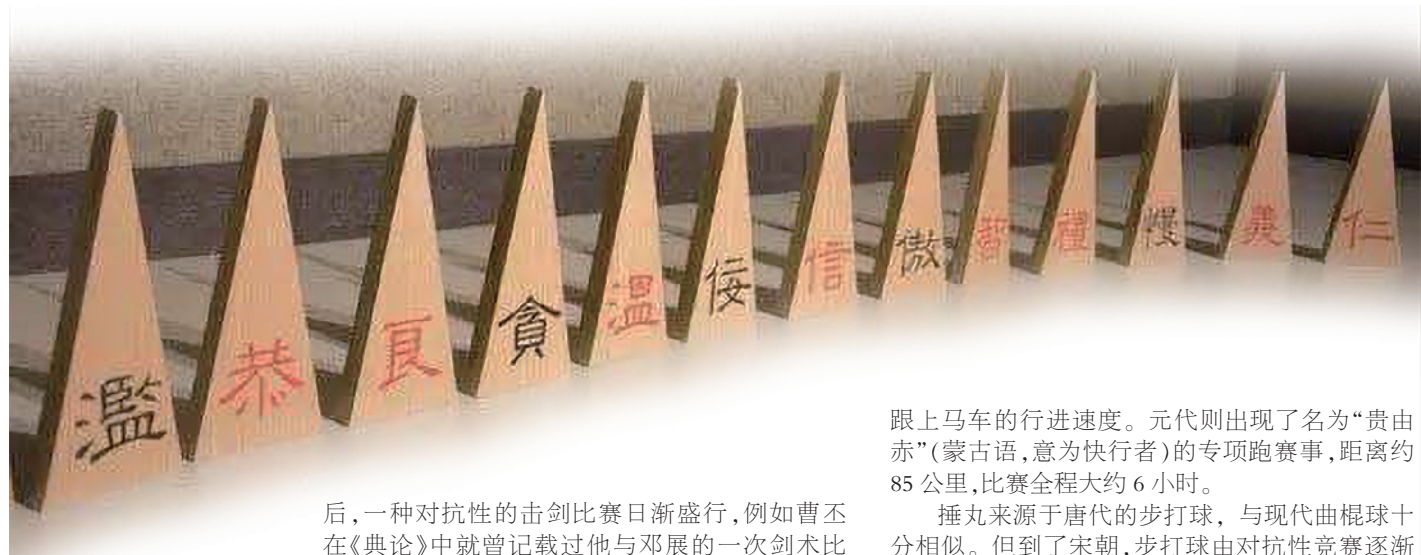
制的试点，综掘二队又是漳村矿增量分红的首批试点。没有前车之鉴，分红奖励如何分配？哪些人可以得到奖励？难题摆在综掘二队面前。  
综合考量后，综掘二队决定让直接产生生产效益的生产班组拿大头，占分红比例65%，剩下的检修班组、辅助工段、活动激励占比依次为15%、10%、10%。“通过比进尺、比正规循环率、比工效、比额外消耗等，最后综合各项指标进行排名，用良性竞争促进班组产生增量效益，到月底进行增量分红。运行数月来，效果十分明显。”综掘二队队长丁磊说。  
为了激活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，综掘二队结合“班组合伙人”和队组实际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修正，将队组权力下放至各工段班组长，班组长可以根据工作难易度、辛苦度、技术性等多项指标，对每个人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精

益分等分数的分配。也有班组长主动放弃高系数，将自己多得的精益分分摊给工人。但不论哪种方法，都是为了确保安全，促进生产，更体现出班组长权力的灵活性和自主性。  
班组分值都是日清日结，并由队组最后把关，每个人的分值因出勤率、工作技术各异而有所不同，形成了多劳多得、少劳少得、不劳不得的激励机制。队和班组、班组与员工之间也因此构建起市场运行管理和评价体系，打破了“大锅饭”现象。  
不过，漳村矿生产队组的地面人员因为不生产，就没有精益分，因此不参与增量分红。但为了政策公平、制度合理，漳村矿专门开设了员工讲精益活动，无论井下员工还是地面员工，只要有好点子、好经验、好方法，对安全、生产、经营、管理、创新有提升和帮助，一样能得

精益分。  
最终，漳村矿用精益理念指导“算账”文化，从总预算到总工期再到总费用，进而分解到生产、通风、排水等具体业务板块，再由职工分区承包负责，实现了明确责任、义务细化、层层落实、件件到人。同时，利用算账牌板，公示每旬、每月的工作完成情况，用最直观的方式解读工作、反映问题、寻找解决办法，提升了工作效率。  
漳村矿通过大账小账一起盘，盘清了账目；制度流程一起上，明确了责任；横向纵向一起找，找出了差距；物质精神一起用，激发了干劲；方法效果一起要，强化了执行；当前长远一起增，增添了效益。靠具体实践，用数字说话，以结果论“英雄”，漳村矿通过“算账”破难题，为企业转型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。（作者供职于山西潞安化工集团漳村煤矿）



## 古代体育也丰富



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国内再次掀起全民运动热潮，人们热表现现代竞技体育的同时，也纷纷关注起中国传统体育项目。事实上，我国古代虽无体育一词，但却拥有丰富多彩、充满娱乐性和趣味性的体育活动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 
中国古代的体育项目与赛事，多与军事训练相关。孔子推崇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这“六艺”中，射、御是源自骑马驾车打仗的体育运动。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，就产生了最早的体育奖杯，即周王赏赐给射箭冠军柞伯的“柞伯簋”，称得上是奖杯鼻祖。  
击剑是中国古人最熟悉的体育项目，佩戴刀剑行走江湖，是古代游士的标配。古人痴迷名剑，传世诸多名剑，比如越王勾践剑、吴王夫差剑等。佩剑、练剑、击剑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，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记载：“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瘢。”此

程新兵

后，一种对抗性的击剑比赛日渐盛行，例如曹丕在《典论》中就曾记载过他与邓展的一次剑术比赛。唐代时，舞剑之风盛行，杜甫在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中用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”描述了公孙大娘舞剑的绝技。只不过，中国古代击剑一直朝着自卫、健身、杂技表演等方面发展，并未演变成现代击剑运动。  
蹴鞠起源于齐国都城临淄，齐宣王在位时期已经盛行。汉代，蹴鞠被视为治国习武之道，出现了研究蹴鞠运动的专著《蹴鞠二十五篇》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体育著作。  
汉高祖刘邦不但爱踢球，还专门在宫苑建造了“鞠域”。汉武帝刘彻将蹴鞠列为军事训练科目，以提高将领的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，同时训练士兵、考察兵将体质。到了唐代，蹴鞠的制作工艺和运动技术都有了很大改进，球变得更圆、更轻，充气技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。后来，宋代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，清代开始流行冰上蹴鞠。  
跑步是现代最普及的健身方式，也是竞技体育的常设项目。在中国古代，跑步引入竞技体育的最早雏形来自于步兵，因为古时作战，要求士卒必须具备长跑能力，当年周成王就用赏赐奴隶来激励步兵坚持长跑。到了汉代，出现了职业跟随马车跑步的“伍伯”，其基本技能就是要能

跟上马车的行进速度。元代则出现了名为“贵由赤”（蒙古语，意为快行者）的专项跑赛事，距离约85公里，比赛全程大约6小时。  
捶丸来源于唐代的步打球，与现代曲棍球十分相似。但到了宋朝，步打球由对抗性竞赛逐渐演变为非对抗性比赛，改名为捶丸。《丸经》记载，捶丸是在空旷地上画一球基，离球基七步至百步做一定数目的球窝，旁树彩旗，用棒从球窝击球入窝，以用棒数少或得穴数多的一方为胜者。从所记场地、运动用品、竞争人数、竞赛方式、裁判规制等方面来看，其与现代高尔夫球很相似。  
木射亦称十五柱球，创于唐代。唐陆贽编写的《木射图》介绍，这种比赛一般在室内进行，场地一端设立十五个笋形平底木柱，用红笔在十柱上写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，用黑笔在五柱上写“慢、傲、倭、贪、滥”，参赛者用木球击打木柱，击中写有红字的木柱为胜，击中写有黑字的木柱为负。这样看，木射与保龄球极其相似。  
当然，中国古代的体育项目远不止这些，还有射箭、角力（摔跤）、马球、围棋、踩高跷、放风筝等，有些长盛不衰，有些不断发展变化，比如捶丸、角力，在现代足球和相扑运动中还能看到影子。  
中国古代体育运动总体而言娱乐性较强，竞技性较弱。因为在传统文化中，中国人更注重人的内在气质、品格和精神修养，而把人的身体视为“寓精神、气质之舍”，这就使传统的体育价值观透射出明显的重精神、重人格倾向。（作者供职于厦门市湖里区发改局）

## 漫话惊蛰



陈赫

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，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，是惊蛰。  
惊蛰在农历每年二月初一前后，是指春雷乍动，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，标志着仲春时节开始。  
惊蛰曾被称为启蛰，在汉景帝以前的文献中，有关惊蛰的表述都是启蛰。《左传·桓公五年》曾写到：“凡祀，启蛰而郊。”意指凡是祭祀，启蛰时举行郊祭，郊天之礼是周代最隆重的祭典，祭祀天地日月，皇帝亲自参加。成书于战国时期、我国最早的传统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也记载：“正月启蛰，言发蛰也。”  
启蛰在汉景帝时被改称为惊蛰。因汉景帝名为刘启，为避名讳，便将“启”改为意思相近的“惊”。这一点在南宋经史学者王应麟的《困学纪闻》中有所记载：“改启为惊，盖避景帝讳。”  
这次改名还引发了中国节气史上的一次巨变，节气顺序有了很大调整。汉景帝之前为“立春、启蛰、雨水、春分、谷雨、清明”，汉景帝之后为“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”。  
唐宋时期，“启”字的避讳已没有必要，启蛰又重新被使用，不少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现其身影。如柳宗元《非国语·不藉》：“启蛰也得其耕，时雨也得其种。”南宋曹彦约《惊蛰后雪作未已阴之湖庄》：“启蛰候虫犹自闭，向阳梅子自能酸。”  
启蛰一词的使用，一直持续到唐开元年间。由于人们长期的用语习惯，著名僧人一行编《大衍历》时，再次使用了惊蛰一词，并沿用至今。  
惊蛰在历史上沿袭千年，也有众多习俗流传下来，比如祭白虎化解是非。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、是非之神，每年都会在惊蛰这天出来兴风作浪，人们为自保，便在这天以猪血、生猪肉祭祀白虎。另外，古人想象雷神一手持锤，手连击天鼓，人类也要顺应天时，利用这个时机来蒙鼓皮。  
“促春遽时雨，始雷发东隅，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”惊蛰时节，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春耕大忙季节，万物进入灵动时分，一年的希望正由此时开启。



## 读书贵有思

《南史》记载了一个故事：南朝时有一个叫陆澄的人，勤奋好学，读书很多，人们都称赞他为博学之人。  
陆澄读书虽多，但大都是死记硬背，从未花时间去思考书中的内容或探究学习中遇到的疑问。比如他读《易经》，读了三年还没有弄清楚文字的意思。到了晚年，他想给刚灭亡不久的刘宋王朝编撰一部《宋史》，结果琢磨了很长时间无从下笔，最后也没有编成。  
当时另一个叫王俭的文学家是陆澄的朋友，知道了陆澄这些尴尬事迹之后，便打趣地说：“陆公，书橱也！”意指陆澄是个行走的书橱，这话实际上是在调侃他读书虽多却毫无用处。  
所以说，学习过程中不仅要熟读书本内容，还要深入思考和消化。孔子曾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一味读书而不思考，就无法深刻理解书中内涵，甚至会陷入迷茫，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，才能学有所用。苏轼曾安慰一位落第秀才，并告诫他：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意思是说，经典的书一定要多读，而且要深刻思考，这样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并将所学知识加以运用。

古人在阅读方法上，还有一种特殊技能：不求甚解。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喜欢读书，却从来不着眼于一字一句的解释，更不会在个别字句上过分下功夫探究。这自然不是陶渊明读书不认真，而是他只理解作者的精要，往往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。  
诸葛亮读书和陶渊明很相似。东汉末年，诸葛亮曾在荆州学习，并和寄居于此地的颍川人石韬、徐庶、汝南人孟建一起交流探究。其他三人读书时都非常精深，对一些细节不啻不罢休，唯有诸葛亮只求理解大概意思。  
其实，无论是不求甚解还

是独观大略，都是一种阅读策略，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思考。阅读时先将书或文章从头到尾通读一遍，碰到不懂的地方不纠结，继续往下读，这种方法能够节省时间，而且阅读中必须全神贯注将所思所想带入字里行间，这样感受和共鸣会更多，并能逐渐养成思考的习惯。  
读书方法众多，却都离不开勤奋、刻苦以及专心，但更重要的还是思考，只有在学习中不断分析、对比、消化，才能收获更多。

